

琴台
琴瑟
潘國森

上一回到台北，是前年隨團出席台北「世界潘氏宗親總會」的會慶，今回再到台北，便問主席大姐，有什麼事情要我到總會那邊辦？如帶禮物、送口訊之類。主席說不必，再問我去台北幹啥，隨口便說去歌迷會的活動。主席似有點啞然失笑，問道：「你去歌迷會？」於是，便想起《神鵰俠侶》的一段小插曲，周伯通嘲笑舊日的「鐵掌水上飄」裘千仞、當下的慈恩和尚「怎地愈老愈胡鬧」？

所以，我其實不甚願意加入「蔡幸娟香港歌迷會」，前番有感於會方沒把我當外人，便對會長金耳大哥說倒不如我也入會，一旁的會中高層驚訝地說道一直以為我已入了會。會長卻說我還是不要入會的好，怕人家會質疑我對娟姐（粉絲對她的暱稱、敬稱）的讚賞有偏頗。其實潘老頭好歹也算是個藝評人，如果有下筆偏私，以後還能夠在江湖上混下去嗎？不過，不入會也好，免得江湖上都笑話我「怎地愈老愈胡鬧」？也不怕給人非議為「崇拜偶像」了。

這回是一年一度的慶生會，由二零一二年至今，已經是第七年。我除了二零一三年去過，此番還是第二回。台中的三娃哥為今年的「蔡幸娟慶生會」命名為「幸福的預感」，真佩服他能夠每年都想出新名堂。現在每年的慶生會有一大特色，不敢說世上唯一，但也算絕無僅有了！就是慶生會不是「羅漢請觀音」、乃是「觀音請羅漢」，各地的粉絲都是壽星女的客人，不用付鈔！

計劃落空

各地歌迷朋友常問我，因何缺席多年？官方的答案是：「把機會讓給其他朋友。」那今年為何又來？對曰：「有特別任務。」

事緣娟姐先前曾明令各地朋友來慶生會都不要再送禮物，這反映什麼？實是娟姐把粉絲送的禮物當一回事，禮物太多，家中就算寬敞也放不下。如果是別的不把粉絲當一回事的天王巨星，純為業務宣傳而與粉絲互動，那麼粉絲費盡心思的禮物，很可能立馬就給送到垃圾桶去。

娟姐既明言不收禮物，我老人家自有辦法，要弄一份不能不收的禮物，就是將過去一些雜文整理，再加新寫的文字結集成書，就以往本欄發表過的《歌后殿軍蔡幸娟》為書名。事前，做足保密功夫，將此拙著的第一冊，在慶生會上親手交給她。寫這書原本不在寫作計劃之中，只因香港歌迷何偉賢兄一寫就寫了三本專著，然後有朋友在網上社交媒體「臉書」上說潘國森也應寫一本。這就有如觀眾現場點唱，若潘老人家「唱不出來」，以後在江湖上怎樣混得下去？

不過，守規矩的人總是吃虧，當天許多朋友都犯禁禮物照送，娟姐還是欣然接收。於是乎，娟姐只收我禮物的計劃就落空了。

■何偉賢著：真愛小調歌后蔡幸娟。 作者提供



萃袖
乾坤
余似心

幾位朋友在閒聊，當中僅一位男士，他事業有成，位至大集團高層。那天大家無所不談，講兒子與女兒，講職場上女性越見出眾。那位男士說，女性的確較男性早熟，在男孩子還停留在波牛階段，同齡的女孩子已經懂得為自己的前途打算。

他說：「很多人都說女上司要求過多，男上司會隨和一些，其實這是由於女性的觀察能力較強，連細微之處也兼顧到。」他又說：「即如我見太太時常為子女緊張這緊張那的，初時也覺得她擔心過多，後來才發覺她的擔憂和要求是正確的，我沒有這樣的心態只是因為我看事情不及她那般細心和有遠見，是因為我看不到，所以不懂得擔心。」

「故此，很多人都說有女兒好，更曉得孝順父母，就是女性天生的這份細心。這並非兒子不孝順，而是看不到有什麼應該要做的，以及不知道該怎樣做。回想起來，我混混沌沌地成長，不知怎樣，父母年老了便過身了！」

無心肝的男人

一位事業成功的男士，這樣子形容自己，聽來有點好笑，但也很真！女性眼中的無「心肝」，原來是男人的天性！可見一個頂天立地，威震天下的男人，他們的內心世界可能仍是個大男孩。即如電影《春嬌與志明》中的一句對白：「男性基本上在中四以後便不再長大」，聽來實在令人會心微笑，的確，身邊實在太多四十、五十、六十……歲的中四男生。

女性，也常希望做小可愛，但現實不由人，生理變化、社會競爭、生兒育女、現實逼人，都催迫着自己長大，尤其是當上母親後，責任感逼人成熟。除非一生環境改變不大，凡事有人代為安排，那樣就會停留下，但不覺得這是好事。明白男女腦袋之別，兩性就能更互相體諒！

■男女的思考方式天生有別，勿強要求對方和自己想法一樣。 作者提供



網人
網事
狸美美

不知是不是現在的電視「真人秀」太多了，以致在最近的兩會採訪中，竟也上演了一齣引起全民狂歡的「紅藍真人秀」。

這是一場始料未及卻又讓人着實沮喪的新聞記者「炸裂秀」。小狸是學新聞、做新聞出身，但記憶中尚不記得古今中外有如此這般相同案例——3月13日上午，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「部長通道」上，一位自稱「美國全美電視執行台長張慧君」的紅衣女記者向國資委主任提了一個足足接近 50 秒的問題。就在她冗長又「大而不當」的鋪陳過程中，站在其身旁的一位穿着藍色上衣的女記者——據事後流出的微信對話截圖可知以及證明，當時這位名叫梁相宜的藍衣女記者的心理活動是「瞅她那德行，問問題比回答的還多」——應該忍無可忍了，故先後做出了誇張的皺眉頭、斜視、轉頭、棄棄等表情動作，甚至還偷偷豎起了中指，最後更刺了紅衣女一個大大的白眼兒，以示深度鄙視。就是這樣的一個說長不長、說短不短的片段，在央視的新聞報道中不經意地、喧賓奪主地被放大了，被「炸裂了」了，被千千萬萬個吃瓜群眾「狂歡」了。這實在是當代互聯網史記中不能漏掉的一筆。

從13日的午後開始，「花式白眼」、「紅藍CP」、「紅藍爆料」接踵而至，每個人的朋友圈都被一遍遍地刷屏了。從最開始的「以為藍衣梁在搶鏡，鄙視！」到後來的「原來紅衣張才是『提問婊』，鄙視！」再到後來的「原來紅衣張一貫這樣，每次都處心積慮搶鏡頭，博出名，更自詡氣質姐，超級鄙視！」吃瓜群眾一邊熱烈

地互通信息，一邊創造着獨特的互聯網價值，比如淘寶火速推出了藍衣梁翻白眼的手機殼、文化衫等周邊產品，而紅藍二女的微博粉絲飛速增長，幾個小時內瞬間躋身網紅行列。許多網友不無羨慕地在她們的微博下留言：「小姐姐你火了。」因為在中國，火了就代表「錢來」，完全不用管這個「火」是好火還是捋火來的。於此，「網人網事」之拍案驚奇，小狸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：

首先所謂記者，在小狸的心目中一直都應該是「無冕之王」，雖然近些年內地蠅營狗苟，甚至是淪為狗仔的自稱記者愈來愈多，但並不妨礙這四個字在理想中的崇高地位。提起「無冕之王」，不僅令人想起李大釗的名言「鐵肩擔道義，妙手著文章」，更令人想起普利策的專業推崇：「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，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。」但此刻，請問紅與藍，你們究竟在那天的兩會上，瞭望了些什麼呢？吃瓜群眾的哄哄是一回事，心裡如明鏡兒似是另一回事。紅衣氣質姐：提問不是表演，天職更不是作秀，難道你不知道麼？同樣也是迷了此道的藍衣白眼帝：性格耿直是優點，但面對觀眾時要時刻注意言行和儀態，這不僅是記者的素養，更是記者的社會責任。

其次，令小狸更沮喪的是整個事件的氛圍。氣質姐之所以會成為處心積慮虛出風頭的「提問婊」，遵循的邏輯是「人紅最重要」，而不管這個紅是好紅來的還是姍紅來的。這和前面的網友思維是一模一樣的。而如果一個社會，對於什麼叫「有本事」、什麼叫「不要臉」都不清楚了，那還有什麼可談的呢？

思旋
天地
思旋

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日前圓滿閉幕，順利完成了換屆任務。港人熟悉，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會主席，深慶得人。汪洋當選後，向全體委員發表了重要講話。

今屆全國政協會議以民主、團結、協商、奮進為主題，委員們嚴守紀律，參政議政。強調協商民主的新時代要有新作為，汪洋形象地說：「畫最大同心圓，聚強大正能量。」以此作勉勵。

可以說，今次政協會議決議，依憲法依法律，挺香港融入國家大局，政協章程增加「全面準確貫徹『一國兩制』、『港人治港』、高度自治」，這對於香港委員以及香港市民而言，感到特別欣慰。會風清正，紀律嚴明，委員深感任重道遠，人們對於為國貢獻的委員們表示衷心感謝。

從報道中得知，委員們提了不少意見和建議，尤其是對港珠澳、大灣區藍圖出謀獻策。事實上，政協委員都是在各個領域的精英、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：「發展是第一要務，人才是第一資源，創新是第一動力」這三個「第一」都是政協委員所擁有的。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及地區的支持以及三地人民共同

要務、人才、創新

努力下，必將成為世界最優秀的灣區。

港區政協委員近日返港後積極向熟悉朋友介紹兩會精神。其實香港委員人才輩出，連任政協副主席的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前特首，顯然是過去公職彪炳所致。新當選政協常委的香港委員眾多，大家所熟悉的是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。自退任後，古稀之年獲提名全國政協委員，旋即更獲選為全國政協常委，實在是女性之光。陳太認真履行職責，近日常在媒體中露面，詳細講解她自己對衛生、健康、醫療改善的意見和建議。

另一方面，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新當選為政協常委，可喜可賀。蔡冠深回港後即在中總組織座談會，向會員們解說兩會精神。當然，與會者都懇切期待蔡常委詳細介紹修憲精神，及對香港繁榮穩定的作用。香港中華總商會是愛國愛港的工商專業團體，人才濟濟，極其符合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三個「第一」：「發展是第一要務，人才是第一資源，創新是第一動力」，必然對他們所關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出盡財力和人力資源，創新科技尋找商機，成雙贏之局。

作為香港人，必須為國為港的發展奮進。

開在青苔之上的生命之花

讀書愈多，我愈發覺得，閱讀是一個生命聆聽另一個生命，一顆心靈碰擊另一顆心靈，縈繞在耳畔的聲響，那是靈魂的震顫。捧讀袁凌《青苔不會消失》這本特稿集，是源自三個關鍵詞：底層生存、不忍心、非虛構，接受採訪時他說：「活着是一個忍心的過程，你要忍住自己的心腸，不是說你沒有心腸。」

這使我想起阿列克謝耶維奇曾說過的一句話：「我是通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這個世界的。」其相同之處都是，面對他人生活或生存困境時的悲憫心，以文學切片來解剖現實之痛和人性複雜，給予溫暖的平視、細微的關照、長遠的思考，用隱忍而克制的筆觸，「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」，從而形成一種「去蔽」又「不迴避」的文學質地。用主持人柴靜的評論說：「他的寫作，是沉沒在這些人的命運裡，活上一遭，以作償還」，此償還，我認為就是愛的救贖。

礦難中的倖存者，致殘無力的塵肺病礦工，北京城中村大雜院混居做小生意的局外人，戰爭遺留下來的地雷村的殘疾村民，被漢江水污染的生靈，蘭考大火燒痛的棄嬰，高牆外的留守兒童……這本書由「卑微者、出生地、生死課」三部分組成，撲面而來的是觸目驚心的生存鏡像，真實而細膩的捕捉，雜糅和綿密的質地，將日常生活中那些容易被淹沒、被侮辱、被損害的邊緣群體呈現出來，使人在沉重壓抑中吞吐生死之嘆，省思個體之遇。

閱讀這本書是一次艱難跋涉，我多次中斷，停頓下來，審視自我：面對他人的不幸甚至不堪，你或許只有閉嘴的權利，然後轉身，積蓄更多勇氣去直面人生，完善自我。《血煤上的青苔》中，歷經礦難致殘的人們，用一個「熬」字不足以形容他們的苟活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收拾大小便。黃國林大腿上的瘡口已經深到骨頭，塞着一坨衛生紙；雙目失明的鄭樹禮，重新學會家務和種地；坐在輪椅上的高章平衣服下面帶着尿管，他已經掌握大便的時間；王多權則是用雙手把自己萎縮的下肢翻過來，「像少年時在山上炭窯裡翻弄燒成的木炭」，但是，還有很多絕望了的難友倒在了尊嚴門檻外面。

記得作家史鐵生說過：「死不足惜，關鍵是活着。」在逼仄的生活面前，牢牢扼

住命運的咽喉，活出一條路來，我從書中讀出太多掙扎而又顫抖的姿態。被塵肺病判了死刑的苦難礦工，呼吸就像利息高昂的賒欠，他們的餘生是一個拉長了的消音過程，久而久之，成為土地上的一道巨大裂痕，裂痕罅隙中反射的光最終也被塵土覆蓋。九歲女孩楊軒和奶奶的命運門檻，成為無法逾越的苦難大山：爸爸車禍身亡，媽媽改嫁離開，爺爺腦梗去世，唯一的小叔叔杳無音訊，只有堂屋地面上的青苔，無聲的修復着這個世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袁凌的底層敘述，小人物的境遇錯綜交織，上一段還是甲和乙，下一段就過渡到丙和丁，然後寥寥幾句，又回到甲或丙，有種記錄片式的黑白光影質地感。在《地雷上尋找家園》、《漢水和祈禱》、《大涼山生活：日常的和憂患的》，關照的是個體，也是所有人的遭際：無論是地雷遍佈的山村，被污染的漢江水，還是留守兒童和老人守望的大涼山，都讓人唏噓嘆嘆，又不得不去思考：物質貧乏可以扶貧攻堅，精神貧瘠和自然貧血該拿什麼來治癒呢？就像作者所言：「眼下的漢江，勉力保持着舊日底色，似乎少年透明皮膚下的血管，細弱又全無防護，經歷着一場獻血手術，直到獻出全部血液，生命衰弱休克，卻不足以表明心跡。」

就像《神冤的贖價》一文中，「沒有事物是免於毒性的，土地、河水、作物之外，每個村民和礦工都成了神毒的一部分。」哪怕採取措施，環保人士、公益組織介入，在土地上種植草藥，但是，一噸的事後補救遠不及二兩的事前預防，很難根除「『興災元們』腰際的一塊莓苔，就像吳家輝院子裡那些塌了一半的老屋，苔蘚已經侵入土牆內部。」

當然，大時代背景下，他沒有忽略那些特立獨行的靈魂，比如，詩人《海子：死於一場春天的風暴》，「從第一次乘夜班火車離開家鄉，他不論走出了多遠，卻從未反抗過鄉土給予他的這份饋贈和義務。」追憶海子是一種映照，看到卑微者的詩性光芒，也是袁凌內心愧疚的一種補償，一顆負傷的被折斷的麥子死去後，落在地裡長出更多的麥子來，暗合着他對家鄉的回顧。

袁凌有句話令我銘心：「在浮泛的事

腹有詩書氣自華

如果你問，寫文章最困難的是什麼？我的答案是，「命題」。

有了好題目，思路的泉源自會如江水流下，片刻成文。當然，肚子裡必然要有不少資料的儲藏，否則，有題目，沒有資料，正像一個人有骨骼，沒有肌肉，自然不成軀體的。當然，有的人會亂湊一番，言之無物，雖可以成個「軀體」，但卻是沒有「靈魂」的。九年前，我曾出版過一本讀書筆記的集子，命題是《腹有詩書氣自華》，這是宋朝大儒蘇軾的名句。

三國時期諸葛亮：「須學須靜也，才須學也，非學無以廣才，非志無以成學。」大學熟知「學而優則仕」，有學問的人，才能當上好官。但上面還有一句：仕而優則學，就是說要當好官的，更應該好好學習。明朝于謙有詩云：「書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憂樂每相親，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無一點塵。」讀書，應讀到上癮的地步，即與書本做到「晨昏憂樂每相親」的地步。讀書，是人生從知識字開始，一輩子都不可缺的生活內容，正像吃飯、睡覺一樣。如果認為自己已經飽讀詩書，不必再讀了，這種「自滿」的態度，只會讓自己的腦子「退化」。

北魏拓跋珪問群臣：「天下何物最益人智？」眾答曰：「其唯書乎！」於是下令求書天下。古代印刷術不發達，更沒有電腦上網，但為人君者仍要搜集書籍以益人智。閱讀的普及決定一個民族思維的深度和高度。一個淺薄、浮躁的民族是無法強大和發展的。即使現在網絡發達，許多先進國家還是提倡傳統閱讀。美國政府陸續提倡「閱讀優先」，英國政府設定「閱讀年」。

讀書是一個人的「心靈之旅」。閱讀也可以說是一個人的「快樂的旅行」。書本裡有浪漫凄美的愛情，人類文明的步履，異域陌生的詠唱，或者還有苦難坎坷的人生。更重要的是《腹有詩書氣自華》，讀書可使人提高素養，提升境界。

實、過剩的情緒和他們真實生活的分界之前，我只能止步。」他的止步，源自精神世界的秩序：從走出出生地的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，到入職四年返鄉後的吶喊《我們的命是這麼土》，再到重回媒體行業的低吟《青苔不會消失》，他念念不忘的是兒時六歲生日時外婆的「禮物」：煮熟的溫熱的雞蛋，和豬圈裡外婆拋擲銀幣的堅實姿勢。所以，那些像青苔一樣卑微的活着的人，就成為了他筆下的主人公。

「青苔是有價值的，它有生命，不是死的東西，那種沒有生命力的乾乾淨淨、漂漂亮亮的東西，還比不上一個不那麼乾淨但是有生命力的東西。」他們（她們）不是時代的豐碑，也夠不上無名英雄。像土地一樣，不反射光線，但質地無可懷疑。他們貼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，比消費體系追求的舒適更為可靠，也更訴諸內心的直覺，這種狀態被他稱為「修復式生存。」沿着這條小徑，袁凌抵達內心，抑或是說，闖入他人世界的真實程度，取決於自我內心的勘探程度，惟有認識自己，積累更多經驗，才能反彈到一定高度，俯瞰世界，他無形中為「前進中的中國」做了卑微的見證：開在青苔之上的生命之花，沉默無語，體內蘊藉着聲勢浩大的風暴，在經歷人生倒春寒後，迎來春天的陽光。

當下，底層敘事與非虛構成為文學的一種新嘗試或者說新命題，比如，金宇澄的《回望》、梁鴻的《出梁莊記》、鄭小瓊的《女工記》等，不同於這些作品的常見手法，袁凌的寫作是超越記者身份的再探索，強調「經驗質地的可靠性」之餘，他還做着自我「減法」，「通過長期的關切，克服不適和打破隔閡，使外來者的視角內化」，如此苛刻做法既是考驗語言表達的錘煉，亦是剝離情感捲入的理性素養。比如，「不低到塵埃裡，就無法理解大涼山人對於塵土和陽光的信任依賴，不觸到癱瘓礦工乾枯的下身，就不足以理解生命在漫長歲月中的煎熬萎縮。」

由此可見，非虛構不只是一種態度，更多的是一種誠實的精神：是「寫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倫理道德承諾」（李敬澤語），這樣一來，就不難理解書名的內涵，「青苔不會消失，只要世上還有，最後一個窮人」，暗喻卑微者的向上攀緣和不屈抗爭，指向的其實是芸芸眾生。

昨日
紀
陶然

忽然想起景山公園。最近一次去景山，還是二零零七年十一月，在第七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結束後，我回母校北師大，由正在那裡攻讀博士學位的艾尤陪同。我當然不是沒去過景山，在北京上學時，就曾爬上五峰中最高萬春亭，登高望遠。當時萬春亭是北京城的最高點，也是北京城的中心所在。從萬春亭望過去，故宮、午門、天安門、正陽門成一直線，氣象萬千。那時，秋風從八面吹來，喝一杯茶，非常適意。

雖然到過景山無數次，但對景山認識不多。最著名的，無非是明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舊曆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攻進北京時，明思宗（崇禎帝）從紫禁城的神武門倉皇出逃，跑到對面景山東坡的一棵歪脖老槐樹下，自縊身亡。時年三十三歲。其時明思宗身旁僅有太監王承恩追隨。這棵槐樹，到了清代，被順治帝加上鎖鏈，名之為「罪槐」。一九零零年，八國

聯軍將那鎖鏈鋸走；一九五六年拆除樹圈，改為欄杆。文革時，老樹樹皮和樹枝被各地來景山旅遊的紅衛兵剝去當紀念品。一九七一年，「罪槐」被伐除，也有傳說這棵槐樹並未死去，就被除去。一九八一年，公園管理局將在景山南坡找到的一株碗口粗的小槐樹，移栽至老槐樹原處。一九九六年，又將東城區建國門內北順城街7號門前，一棵有一百五十多年樹齡的古槐，移至老槐樹原處。艾尤領我在那已非原樹前觀看，眼前竟浮現出金庸武俠小說《碧血劍》的一幕。

景山又稱為煤山、鎮山，是一座人造山。清順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又將「萬歲山」改稱為「景山」，至今。一九六六年，紅衛兵大串聯，並且說了算，他們把景山公園改成「紅衛兵公園」，北海公園則改成「工農兵公園」，當我騎着自行車經過時，不免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細想一下，那已經是遙遠的記憶了！當我

重回，景山依然，多少前塵往事，卻像急流似的，在腦中迴旋。是的，曾經發生過的，都不會輕易忘記。

記得那一年，在景山旁邊的景山東街，是初冬吧，我曾經在面對紅牆的小樹林疊起磚頭坐下，聽公共汽車從後面的大街上駛過，車聲交替鳴響，車前燈晃過來又晃過去。這樣的車聲，我從沒好好地聽過。那一晚，卻讓我邂逅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還會沒有那樣的機緣，重新遭遇如此的境況。我記起很久很久以前，當我年紀小，夜晚躺在赤道山城的山上，看着天花板上汽車燈光反射在流瀉，漸漸墮入夢境中，何曾會想到多年後也有一個如夢的幻境？人生的奇妙，莫以此為最了。當我又從景山走過，人們白天的腳步匆匆，我再也找不到那夜的餘韻了。雲遊景山的人來來回回，但我碰到的盡是陌生面孔。乍然見到一個熟人，似曾相識，一楞，驚醒過來，卻原來是南柯一夢。